方苞治边方略探究

张 刚

（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方苞不仅在文学创作和经学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在边疆治理方面也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是整个清代都难得一遇的治边良才；曾先后提出“平定准噶尔之策”“安定台湾之略”“贵州苗疆之议”等一系列治边方略，既系统阐述了经略边疆的各种措施，又巧妙地将儒家经义宗旨与经世致用追求融为一体，从而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重视，成为满清王朝边疆治理策略选择的重要来源之一，对清中前期边疆巩固乃至国家统一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方苞；边疆；治理；满清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1-0145-06

收稿日期：2024-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ZX078）：儒家治边思想在西南地区影响与发展。

作者简介：张刚（1976-），男，安徽和县人，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1.016

方苞（公元 1668-1749 年），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是清朝著名的文学家和经学家。后因牵连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两年后被康熙皇帝御批赦免，以布衣入直南书房，自此成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身边重要谋臣之一，其间参与了诸多边疆治理事宜的咨议与决策，对清中前期边疆巩固乃至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方苞治边方略的形成背景

自立国始，清朝统治者就比较注重边疆地区的巩固和捍卫。在没有统一全国的情况下，顺治帝就坚决武装抵抗沙俄对东北黑龙江地区的入侵；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随即就派军收复了台湾；公元 1696 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叛乱，加强了对漠北地区的管理；公元 1724 年，雍正皇帝平定了青海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消除了当地割据分裂势力；公元 1759 年，乾隆帝又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之乱，在新疆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等等。可见，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时期，清朝边事不断，先后消灭或招抚西北、西南、东北等广大边疆地区的政治势力，实现和维护了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开创了清代疆域的鼎盛时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於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①。方苞虽是汉人，但对满清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高度认同和赞许。他曾撰《圣主亲征漠北颂》一文，称赞康熙皇帝征服漠北边陲的勇气和壮举，“遂使普天之下，穷荒不毛之域，尺地寸土皆归版舆。……自汉、唐以来，未有跻登兹盛者也。”②即认为满清王朝真正实现了儒家一直追求的大一统政治格局。

方苞学问扎实，历来追求经世致用，故而也不可能不关注边疆战事。公元 1690 年，他因弟弟方林生病去世忧伤过度，曾在朋友季咸若家避居了一段时间，其间，他与季咸若的父亲季熙就经常讨论康熙亲征噶尔丹的事迹。③ 方苞此时才 22 岁，这说明从年轻时候他就有了“仁涵九区，风驰四裔”④的胸怀和志向。康熙五十七年（公元 1718 年）四月至九月，方苞曾伴驾出巡塞外，得以对北方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走访考察。

①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地理志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年，第 277 页。

②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九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850 页。

③参见朱洪《方苞传》，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23 页。

④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九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864 页。

在写给朋友左未生一篇赠序中，他谈及自己此行的特殊感受，“余生长东南，及暮齿而每岁至此涉三时，其山川物色久与吾精神相凭依，异矣”①。常年生活在南方的方苞初次去塞外边陲，却觉得与此地山川景色在精神上早已相融相济。这说明他对北方边疆地区不仅有理性认知，也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兴趣。后在朝廷为官，方苞除了关注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等民生问题外，对边事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系统深入。他曾在《叙交》一文中讲述了自己与朱轼的交往情况，其中就提到了他对边疆治理事务的思考。“自是以后，凡吏疵民瘼，辨贤抑奸，胸中所知见，壹为公尽之。且告以海内大事宜及时注措者，莫如复明初大宁三卫，兼求唐韩重华屯田故迹，自归化城西连三受降城以达于宁夏，及经略苗疆，控制台湾三事，因尽出余论七篇，公皆慨然引为己任。”②这段话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方苞认为，在当时国家最重要也是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政务就是边疆治理和巩固的问题，所以用了“莫如”一词；二是认真研究过中国古代相关边疆治理史实及措施，才能脱口列出“复明初大宁三卫”、“唐韩重华屯田故迹”等事迹；三是对边疆治理问题必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否则难以在短时间内一次性拿出多篇关于边疆治理策略的文章，且得到朱轼的高度认可。因此，方苞治边方略既是康、雍、乾三朝治边现实需要的产物，也是其对儒家“大一统”精神的躬行，更是其忧国爱民胸怀的直接体现。

二、方苞治边方略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方苞治边方略内容丰富且复杂，现主要介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几方面内容：

（1）平定准噶尔之策。公元1688年，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康熙皇帝先后三次御驾亲征，历经七年才平息了这次叛乱。但到了雍正时期，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通过实施一系列积极措施使准噶尔部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部族繁滋，物产富饶，其势力范围达到极盛，并且身后还有沙俄的支持。因此，随着内部稳固和实力的增强，蒙古准噶尔部再次叛乱，并侵占了新疆、西藏、青海等大部分地区。雍正皇帝虽立即派兵平叛，但战事进展得异常艰难，一时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方苞主动给鄂尔泰、张廷玉等几位相国上书，陈述自己对平定准噶尔的建议。方苞认为，此时的准噶尔已经今非昔比，平定之策必须调整，“昔唐太宗、元世祖皆百战而得天下，智略如神，将良士武，师行有律，异代莫及焉。太宗之征高丽，世祖之征日本，或土壤相接，或舟楫可通，然且殚力竭财，亡众无功，以成大悔，徒以攻守之势殊，客主劳逸之情异耳。”③自入关以来，满清铁骑可以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同当年唐太宗、元世祖的军队一样。但唐太宗征高丽、元世祖伐日本的军事行动都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距离中国实在太远，致使双方实力对比发生改变。现在派兵征讨准噶尔情况也是一样，“其地绝远，非旬月可到；又逐水草移徙，无城郭可指。其邻近之国，虽仰我威德，至于临敌决机，恐未能实心效命。万一我师既至，而彼复迁徙鸟举，而前劳尽弃，后策益艰。”④当年，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够征讨胜利，也不是采取长驱直入方式，而是“设间示弱，诱使深入”⑤至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南郊的宗莫德市）加以歼灭。因此，根据目前的敌我态势，清朝需要易攻为守，“以今之势，莫若先为不可犯，以待贼之瑕衅”⑥，在靠近西北边疆的地方“择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⑦，“贼不至，则以休吾力而尽之于沟树垒屯。贼至则以逸待劳，以锐击罢，既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马只轮不返。”⑧

与此同时，方苞还主张采取剪除依附蒙古准噶尔部的其他部落，逐步使其势单力薄，从而达到不战而

①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82页。
②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九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64页。
③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65页。
④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5页。
⑤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8页。
⑥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5页。
⑦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5页。
⑧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9页。

屈人之兵的目标。清朝在北方边疆历来以与其世代联姻的蒙古各部落为藩篱，“前世之藩篱在边塞，而我朝之藩篱在四十八家”①，但迫于准噶尔部的强大实力，蒙古四十八部落中的一些已经倒戈相向，成为其与清王朝为敌的辅助力量，“西北诸部，惟丹津王效忠本朝，诸部转心嫉之。喀尔喀徹臣汗部曲六百余骑，自军前背主溃回，遇丹津王部落，残杀妇孺，劫掠牛马，不能尽驱者犹刺伤之。诸部坐视不救，听其载妻子什物从容远去，则众情居可知矣。”②。对于这部分力量，方苞认为要先行征讨，“必以锐师进剿，歼厥渠魁，以彰天讨”③，但要恩威并举，使其“畏威怀德而悔心渐萌，乃可长久”④。可贵的是，方苞还主张利用边市贸易重新笼络这些迫从于准噶尔的蒙古部落，“以本朝威信，渐披其与国。严边市之禁，使王侯贵人非邀恩赐予，无由得锦绣、采缯。部人非通边市，无由得茶布絮蘗、养生送死之具”⑤。蒙古部落的生存发展需要依赖中国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而中国对其畜牧业产品的需求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掌控好就能迫其重新归顺满清。至于背后悄悄支持准噶尔部叛乱的沙皇俄国，方苞也主张利用外交手段加以解决，“闻孽贼所畏惟俄罗斯，岁纳贡献。或与俄罗斯要约：能禁孽贼侵盗，然后互市可常，不然则止”⑥，即要求俄罗斯停止支持准噶尔部的不恰当行为，否则就断绝两国的贸易关系，充分展现出其维护边疆完整和稳定的坚定立场。然后，再明确布告这些部落：“有与交通者，永绝互市；有能破其军擒其将者，以功小大，厚立赏格，使上下欣羡；有能连兵合谋执其君以献者，即分其土地人民以予之，赐金百万，他物称焉。使孽贼孤立恫疑，而与四邻相猜，然后可俟其瑕衅，一举而扑灭之也。”⑦这就利用满清特有的中华正统政治身份昭告天下，共同讨伐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以维护天下一统的王道秩序。

可见，方苞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之策涉及军事、经济、外交、政治等多种手段，内涵之丰富实属少见，也说明平定这场叛乱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有长久的计划安排。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方苞的先见之明，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前后经康、雍、乾三朝，历时 70 年才得以在其内乱之时取得成功，西北边疆地区自此正式纳入中国的历史版图。

（2）安定台湾之略。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与中原王朝建立政治联系可追溯至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派人至夷洲，“得夷洲数千人还”⑧，这里所言的夷洲就是现今的台湾。自此，台湾与大陆就一直保持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联系。但到了十六七世纪之交，台湾被荷兰与西班牙同时占领，沦为西方殖民地。明朝末年，郑成功率军赶走了荷兰殖民者，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公元 1683 年，康熙委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合力攻取台湾，台湾正式被纳入清朝版图。但满清王朝对是否有必要在台湾开府设治存有疑虑和争论，甚至康熙皇帝都曾主张放弃对台湾的经营管理，认为海外蛮荒之地得失都无所谓。但姚启圣和施琅坚决主张在台湾设府开治，留军驻守。“台湾一地，虽属多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被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之荒壤，必籍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⑨即认为台湾是保障东南沿海数省海疆安全的屏障要地，断不可放弃，最终康熙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然而，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并不顺利，尤其到了康熙晚期，吏治腐败，官僚胥吏与土豪劣绅肆意鱼肉民众，以致动乱频繁，如：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 年）爆发了天地会吴求之乱，康熙四十年（公元 1701 年）有刘却抗清事件，康熙六十一年（公元 1721 年）则发生了清朝统治台湾以来最大规模的动乱“朱一贵事件”，等等。因此，到了雍正时期，督抚台湾的地方官员为增强军事防御能力，纷纷要求重筑郡城。但清廷考虑到当地土质疏松、地震频繁且工费成本太大等原因，一时难以决断。而方苞看出，这些积极要求重筑

---

①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24 页。
②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63 页。
③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59 页。
④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59 页。
⑤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25 页。
⑥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64 页。
⑦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25 页。
⑧[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主传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296 页。
⑨[清]施琅：《靖海纪事》，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年，第 61 页。

郡城的官员，更多是为自身安全考虑，而并非为了抵御外敌入侵，“不知设守重洋与内地异，而台湾变乱皆自内作，非御外寇比也。”[①]就是认为，台湾发生动乱最大可能是内乱，而外部势力难以入侵，这是因为台湾独特的地形地貌赋予了它易守难攻的天然战略优势，要想从外部攻占台湾就必须通过素有天险之称的“鹿耳门”，“港容三舟，旁皆巨石，锋稜如剑戟，舟行失尺寸，顷刻沉没，内设炮台，所恃以为固也。”[②]当年，清朝为平定郑克爽和朱一桂之乱，都是将舟舰先集中在澎湖湾，“以伺风潮。风潮时，激水高，港平，众艘齐入，故功成于旬日。”[③]只有涨潮时，舟舰才有机会顺利通过“鹿耳门”天险，故而由外部攻入台湾的难度非常大，毕竟涨潮时间才短短数日，澎湖列岛又牢牢控制在清军手中，“风潮之便，岁不过一时，时不过数日，若盗贼窃发，或外番窥伺，泊舟于澎湖，则夕至而朝捕之矣。”[④]但如果筑了高大坚厚的郡城，动乱又是由内部引起的，即便清军能顺潮通过“鹿耳门”，倡乱者也可占据郡城，“收府市人民财物以固守，南北路隔绝不通，大兵虽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旷日相持，兵罢食尽，欲由鹿耳门馈饷济师，则风潮不便，势难更入，智勇俱困，自拔之不能，遑言克敌哉！”[⑤]这就导致清廷更加难以平定台湾的动乱。因此，方苞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不在是否筑郡城，而在能否疏浚“鹿耳门”天险，畅通到达台湾的港口通道，“以自鹿耳门通安平港，焚石凿沙，广五十丈，用人工帑金之数，恳切入告。先开门左右各二丈以为式，然后次第兴作，积以岁月，何患无成？”[⑥]而方苞如此不遗余力地重视“鹿耳门”港口通道疏浚事宜，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看到了台湾与大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联系：“台湾未开，不过岛夷一蚁穴耳；既开之后，沃野千里，栗溢泉、漳，物产丰盈，盗贼觊觎，故叛乱频作，幸而速平，若措注失宜，不惟七闽之忧，乃滨海九省之剧患也。”[⑦]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孤悬东南海域且又日益富裕的台湾必更易招致盗贼侵扰，长此以往乱及大陆沿海地区势所难免，故不能把台湾问题仅设想成其自身的事情，更不能将其稳定大计系于海潮。这就需要加强港口通道的疏浚与经营，紧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军事联系。

从历史结果看，方苞这个治台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因此，在乾隆四年（公元 1739 年），他给调任闽浙总督的爱新觉罗·德沛写信时又强调：“盖计万世之安，非削除鹿耳门之险，终无完策。”[⑧]说明此时“鹿耳门”天险依然存在，估计是在当时科技条件下实在难以完成此类疏浚工程导致的，但其对台湾与大陆唇齿相依关系的理解与认知无疑值得肯定。

（3）贵州苗疆之议。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原王朝对贵州的经营开发相对较晚，尤其黔东南地区，至清前期还是化外之地。直到雍正王朝，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通过一系列剿抚活动才将其纳入朝廷统治区域，但由于善后处置措施不当，引发了贵州苗民的强烈反抗。雍正十三年（公元 1735 年），古州、台拱一带苗民率先发动了反抗清朝统治的大起义，引爆了自苗疆开辟以来的第一次苗疆大危机。为了应对苗疆地区的严峻局势，清廷不得不调用邻近多省兵力，从雍正十三年起，历经将近两年的艰苦奋战，直至乾隆元年方得以平息这场动荡。此过程不仅漫长而艰难，更让清廷承受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因此，乾隆皇帝特别重视苗疆善后安置问题。

历经十余年的征讨剿杀，贵州苗疆民生凋敝，户口人丁十去五六，致使大量土地荒芜。因此，乾隆皇帝想要乘机在此屯田，一方面可以开垦田地，另一方面则可安定苗疆，“闻近日守土之官，以苗人伤残病死，地多空虚；议募人屯田，乘其衰弱，而据其要害。”[⑨]方苞认为此举必须慎重，不同地区要差异对待，分步实施，“以臣所见，惟熟苗所居，与州县壤接，建堡兴屯，扼其要害，可以制生苗出入，诚为有益。若生苗

---

①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87 页。
②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87 页。
③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九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00 页。
④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87 页。
⑤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87 页。
⑥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九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01 页。
⑦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九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00 页。
⑧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九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00 页。
⑨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84 页。

所居，山峻谷深，地势狭隘，难立城郭，而山径四通，万不可招募屯田。盖天地之德，本宜并育并容，况夺其世世生长之地，绝其妻子衣食之源，使无以自存？虽目今救死扶伤，未敢妄动，而少少生聚，则必奋死以相争夺，阻兵残杀，终无已时。”①“熟苗”指长期归顺当地官府的苗人，一般居住在靠近州县的周围地带；“生苗”就是刚刚被征服的苗人，大都生活在偏远山区。方苞支持在“熟苗”地区屯田，但反对在“生苗”地区屯田。因为“熟苗”地区整体经济文化相对较发达，在平定苗疆过程中所遭受的破坏也较小，所以适当屯田不会对当地苗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而“生苗”地区土地原本就贫瘠稀缺，现在借机屯田侵占，待其人口滋长，必又会因争抢生存资源而再生动乱。

至于留在苗疆驻防的军队，方苞认为，应尽量置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增兵开镇，据其中央，临制四旁。每年兵粮，皆自他省载运。”②即希望不要增加当地苗人的负担，减少激化矛盾的机会。对于交通不便利的地方，方苞提出将戍守之兵尽数撤回，转而采取“以苗治苗”的策略：“土苗百家以上，则择其为众苗所信服者，授以百总之职，置土兵五人；二百家以上，则置把总，土兵十人；三百家以上，则置千总，土兵十五人；皆照绿旗兵弁赐俸给粮，而丝粟不取于苗。其不愿者，亦听之。如此则近苗慕归附之利，远苗无侵扰之害，而苗疆可永远安定矣。”③就是直接从苗寨中推选出为众人信服的人授予一定官职，给予一定俸禄，让其代为约束管理苗人。因为苗人在风俗上只听从苗寨“头人”指挥，强制改为流官统一治理可能会引起苗人反抗，所以，因俗而治不失为一种恰当的政策。

苗疆危机爆发不仅仅因苗民“心不通王化，随其自便，无所不为”④的犷悍之风所致，也与内地军民欺苗太甚有关，“新改归流之苗，以纳租为苦；而归附熟苗，尤苦差役。闻各省苗疆，不独钦差及本地土司，往还路过，搬运行李，尽役熟苗，即家丁、书役、承差出入亦然，是以熟苗不得自营生业，深为苦累。”⑤甚至戍守之兵的粮草搬运也摊派给当地苗人，“舍熟苗无人运粮，上谷崎岖，尽一人之力，不过负米三斗，食至戍所，存者二斗，交粮之后，归途竟无粮可食。”⑥这种长期的刁难勒索会激起苗人源源不断地反抗，所以必须制定规章尽快革除，“惟钦差量定夫役，其余官员俱照内地雇夫，不得空役熟苗。”⑦，至于交通不便之地的戍兵最好尽数撤回。

可见，方苞平定苗疆之策比较注重革除一些传统弊端，要求充分考虑苗民利益。这对缓和清廷与苗民的矛盾，实现苗疆长期稳定确实具有深远意义，也充分展现出儒者博大宽容的胸怀和格局。

三、方苞治边方略的影响及评价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⑧方苞不仅系统完整地阐述了自己对边疆治理问题的看法，也用其改变了清代中前期边疆治理的现状。这首先取决于其独特的身份和地位。他虽曾因牵涉文字狱一度成为戴罪之身，但学问品行始终得到士大夫阶层认可，后又长期在朝为官，与朝中诸多重臣乃至皇帝本人都有着亲密关系，从而使得他的治边思想能够有机会影响到满清王朝的边疆治理决策，如：《贵州苗疆议》就是在自己同僚鄂尔泰要求下，写给乾隆皇帝的奏折，其观点自然很容易被重视。其次，与其忠君忧国的理想抱负有关。“苞闻出位之谋，先圣所戒。然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盖以食土之毛，皆有忠君忧国之心，而询于刍荛，所以尽天下之耳目思虑以广忠益也。”⑨他自然知道

---

①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4页。
②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4页。
③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4页。
④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9页。
⑤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4～185页。
⑥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5页。
⑦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⑨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7页。

“思不出其位”的古训，但出于忠君忧国考虑，即便思出其位也要剀切直陈，“於君不敢欺，於事不敢诡随，於言不敢附会”[①]。正是基于这种行事理念和追求，方苞经常积极主动地陈述自己对边疆治理问题的看法，以求发挥实效。如平定准噶尔之策，他直接将其写成书信分别送给鄂尔泰、张廷玉、蒋廷锡三位相国，并说：“愿俟独对之顷，剀切直陈，虽不能遽夺众议，而圣明天纵，一二载后必重思公言，而审定国家之本计矣。”[②]就是希望他们寻得机会，向皇帝直陈己见。而他们又都是方苞多年的至交好友，接到书信后即面呈雍正皇帝，最终促成清廷平定准噶尔战略方针的调整。最后，与方苞治边方略自身特点有关。朱轼曾评价方苞平定准噶尔之策道：“老谋雄略，一归经术；未审韩、范规模，视此何似？”[③]这说明方苞治边方略有两个特点：一是“老谋雄略”，即全面客观且深谋远虑，让人不得不信服，自觉自愿就会接受他的观点。二是“一归经术”，即始终秉持儒家仁爱宗旨，属阳谋而非阴谋，能从边疆地区特殊情况及其利益诉求考虑治策，非常有利于边疆的巩固和稳定。因此，方苞治边方略才能为满清王朝接受，成为其边疆治理策略选择的重要来源之一。

当然，方苞治边方略也有自身局限性，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西方殖民者觊觎中国边疆领土的野心认知不足。如在安定台湾之策中，方苞始终强调“内防”重于“外防”，即把边防重点放在防台湾内部民众变乱上，而对外来的西方列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与他对西方列强真实情况欠缺了解不无关系：“闻大西洋去荷兰国不远。西洋国俗所不可缺者，惟内地之茶。不识俄罗斯、荷兰诸部，亦赖茶以愈热疾否？”[④]荷兰是17世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海洋贸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台湾也曾被其统治数十年，但方苞对其地理位置、国情民生几乎都不知道，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意识到“外防”才是未来满清王朝边疆治理的重点所在。对此，我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评判，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

Exploration of Fang Bao's Border Management Strategies

ZHANG Ga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Fang Bao not only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nfucian classics research, but also made amazing achievements in frontier governance, which was a rare talent in the whole Qing Dynasty. H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border control strategies, such as “Pacification of Junggar”, “Discussion on Miao frontier of Guizhou” and “Strategy of stabilizing Taiwan”, which not only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 manage the frontier, but also cleverly integrated the purpose of Confucian classics with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us received the attention of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emperors, and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the border management strategy selection of the Manchu Dynasty, which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border area and even the national unity in the early middl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Fang Bao; border areas; governance;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　山阳]

①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33页。

②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5页。

③任雪山：《方苞年谱》（下），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第398页。

④彭林，严佐之主编：《方苞全集》（第八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65页。